

蒙古历、藏历、汉历

黄明信 申晓亭

蒙古历与藏历、汉历三者之间有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系，这里仅就与蒙古历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讨论，谈及藏历、汉历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包括纪年法、纪月法、纪日法及日月食推算法等问题。

藏历是印度传入的时轮历与汉历的混合体，以时轮历为主。汉历在时宪历传入以前被蒙藏称为“老汉历”，时宪历被称为“新汉历”。蒙古历书中兼有藏历、汉历的一些成分。

（一）纪年法

（1）《蒙古源流》有关成书年代的记录，这里涉及到时轮历胜生周纪年法。

蒙古文的原文为：

uryumal törögsen jil yisün ulayan killing-tü kemekü-yin
tabin yisüdüger

若逐字对译是：“生长物出生的年，叫做九紫愤怒的第五十九年。”

此书有清初的汉文译本，将这句意译为“乙丑九宫值年”即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其后近二百年都沿用此说。到1956年比利时人田清波（Antome Mostaert）认为这句话应理解为

“（作者）出生的第五十九年”，而原书的作者生于1604年，因此这个成书年代不是1685年，而应为1662年。现在国际上都采用其说，似乎已成定论。至于“九紫愤怒”，田氏未做解释。

我们理解，“九紫”是汉族历法（藏历同）里“九宫”的第九宫的名称，“愤怒”则是指藏传时轮历的“胜生周”的第五十九年的名字，这里所说的不是作者出生的第59年，而是“胜生周”的第59年。

所谓“胜生周”是从印度传入西藏的时轮历的纪年法，它也是六十年一周期，每一年各有一个名称，就像汉历里用“甲子”作为六十年周期的名称一样，也是用其第一年的名称作为这种六十年周期的总称。这个第一年名叫rab-vbyung，音译为“饶迥”，意译为“胜生年”，相当于丁卯年，因此也可以叫做“丁卯周”。不过，这六十个年的名称互不关联，不便于记忆，所以用处较少。在藏历里更多是用第几个“丁卯周”（饶迥）与汉族的“甲子周”（又称干支周）相结合的办法。例如：公元1984年甲子记为第16个丁卯周的木鼠年，在藏历里是用木火土金水五行各分阴阳来表示十天干。

蒙古历在纪年上多采用汉历的甲子周，蒙文上用蓝红黄白黑五色各分深浅来表示十天干，同时也兼用时轮历胜生周纪年法。现将此例中有关的胜生周名称记录如下：

年序	梵文名	藏文名	蒙文名	汉文名
1	prabdava	rab-byung	sayitur-yaruysan	胜生、饶迥
38	khrodhini	khro-mo	kilingtei	愤怒（阴性）
59	krodhana	khro-bo	kiling-tü	愤怒（阳性）

梵文、藏文、蒙文的“愤怒”都有阳性、阴性之别，时轮历的阳性愤怒年是胜生周的第五十九年。而（第11个）胜生周的第59年正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清初译本与之相符。而作者出生后的第五十九年（1662）是胜生周的第三十八年，该年的名

称为阴性愤怒，不知这里是否是田清波的疏忽。

(2)《蒙古源流》里关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生年的记录。这里涉及到藏历里的释迦纪年法。

蒙古文原文为：

tegün-ü köbegen-inü mön uridu tere uu quluyan-α jil-eče inaysi qoyar miny-α doloyan jayu tabin-u ding üker jil eke samri tudger kemekü qatun-āca...

汉文译文：“其子自前戊子纪年以来，历二千七百五十年，岁次丁丑，乃母必哩玛托特噶尔（藏文 vbri-ma-thod-dkar）夫人生一瑞相全备、顶显阿弥陀佛相、美貌灵异之子（按即与唐朝文成公主结缡之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个“前戊子纪年”和这个“丁丑”，分别各是哪一年呢？

佛教的史书常用释迦牟尼诞生或入灭（即圆寂）为纪元，但是这两个年代具体的究竟是哪一年？异说甚多，藏传就有十几种，其中最著名的有四种：

1. 萨迦派的说法，佛圆寂于公元前 2134 年丁亥。

2. 《旃檀瑞像记》的说法，佛诞生于公元前 1027 年甲寅，实际上来源于汉文的佛教史书。

3. 时轮历浦派的说法，佛诞生于公元前 961 年庚申，圆寂于公元前 881 年庚辰，格鲁派（即黄教）的著作大都采用此说。

4. 迦湿弥罗班禅的说法，佛圆寂于公元前 544 年丁巳。

这些都与现在国际上最普遍的公元前 554 年之说不同。

因此，引用藏文和蒙古文史书，凡是遇到佛诞或佛灭纪元，首先必须知道作者所用的是哪一种说法。

上述的这个“戊子年”，乃是按照萨迦派的说法，释迦牟尼圆寂于公元前 2134 年，以此作为零年，以其次年，即公元前 2133 年戊子为起点进行计算。2750—2133 戊子=617（公元）丁丑。即：松赞干布诞生于公元 617 年的那个丁丑年。与藏文的《布顿佛教

史》、《红史》、《汉藏史集》所载正相符合（此三书都有汉译本）。

但不是所有的藏文史书都采用萨迦派的说法，例如五世达赖的名著《西藏王臣记》则采用浦派的说法。该说是根据15世纪的时轮历浦派名著《白莲亲传》(pad-dkar-zhal-lung)中所说释迦成道在氐宿月，当时有月食的记载，用历算的逆推法推算出来的。而《西藏王臣记》的郭和卿汉文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8—10页）却错误地把佛入灭推算成公元前541年，就是因为不知道原作者采用的是哪种说法之故。

这种释迦纪年法在蒙古史书中也经常见到。

（二）纪月法

在1994年西藏自治区天文星算研究所所编的《第17丁卯周末狗年（1994）历书》中：第一个月记录为“hor-zla-gsum-pa（霍尔月第三）”，最后一个月记录为“hor-zla-gñis-pa（霍尔月第二）”。其实，1994年以前，历年的西藏历书都是如此记录的。“hor”音译为“胡”或“霍尔”，这个词在各个时代所指不同，在这里是指蒙古，因此可译为“霍尔月”或“蒙古月”。什么是霍尔月？它和藏历、汉历的关系又是如何？为什么在西藏历书中的第一个月要记录为“霍尔月第三”呢？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先看看时轮历系统纪月法的特点。

时轮历系统的纪月法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以二十七宿的名字作为月份的名称。

现在汉族习惯于以一、二、三等序数称呼月份，而印度古代最常用的方法是用月亮最圆、即“望”的时刻，在二十七宿（代表天穹的恒星背景）中处于哪一宿、或其附近而命名，叫做“望宿月”。例如：望（即满月、月最圆的时刻）在角宿或其附近的那个月叫做“角宿月”，以下依次为：氐宿月、心宿月、箕宿月、牛宿月、室宿月、娄宿月、昴宿月、觜宿月、鬼宿月、星宿月、翼

宿月。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不必因不同的历法岁首不同而变更其名称。因为它有客观的天文学上的标志，不是人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而任意规定的。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方、哪个教派都不能不承认它。玄奘的名著《大唐西域记》中说：“随其星建，以标月名，古今不易，诸部无讹”，就是这个意思。

2. 以春分作为岁首。

一年的十二个月本来是循环不断，无所谓首尾的。但是为了天文计算和日常生活的方便，不能不给它定出个头尾来。至于把起点定在哪里，则由人自己选择，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这个起点，又有岁首和年首之分。岁首用于天文计算，一般都是采用一个在天文上有特殊意义的位置为起点。时轮历是采用昼夜相等的春分为起点。现在春分所在的月是农历二月，但在千余年前制定该历法时春分所在的月是农历三月（辰月），这个变化是由于“岁差”的缘故所造成的。西藏《历书》遵循时轮历，以春分作为计算起点，将春分所在的那个月作为历书中的第一个月，在这里记述为霍尔月（也是农历）三月。

3. 朔望月的起始。

朔望月是 29.53 天，不是整三十天。印度时轮历将从“朔”到“望”的时间称为“白分”，从“望”到“朔”的时间称为“黑分”，并且一个月的起始又有白分在前和黑分在前两种计算方法。印度时轮历的“望宿月”是以黑分在前计算的，例如：角宿月相当于农历二月十六到三月十五。藏传时轮历一般采取白分在前的计算方法，但固定月圆“望”为十五日，于是“朔”日就不能固定为初一。这与汉历又有所不同，汉历则是固定“朔”（即看不见月亮的那一天）为初一，因此“望”就不一定是十五，俗语有“十五不圆十六圆”，就是这个原因。

4. 有不同于汉历的重日、缺日大小月计算法和闰月计算法。

在大小月、闰月的计算上时轮历与汉历的计算原理、计算方

法和计算结果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汉历求月的大小以朔为准，朔固定为初一日，以前一个月的朔与后一个月的朔相比较，日的天干相同者前月大，不同者前月小。时轮历里月的大小是用重日和缺日决定的，重日、缺日的原理是为调节太阳日与太阴日的日序关系而设置的，重日和缺日的有无和多少，决定该月是三十天还是二十九天，即月的大小。又例如：时轮历和汉历虽然都采用了“无中气置闰”的置闰月原则，但时轮历用“平气”，一年十二个月置闰的机会是均等的，而时宪历用“定气”，十二个月里置闰的机会不是均等的，因此两种历法的闰月也是不同的。

那么霍尔月又有哪些特点呢？

1. 以正、二、三等序数纪月。

如上述所，以序数纪月可以说是汉历惯用的方法，藏历里是在13世纪才开始使用正月、二月、三月……这种以序数纪月的方法，称之为“霍尔月”。

2. 以“寅月”为正月。

正月初一，是过年的日子，也是年首。以“寅月”为正月，这正是汉历中的“夏正”的纪月法。汉历是以日影最短，即昼最短夜最长的冬至为计算起点的，冬至所在之月固定为子月（十二地支之首）。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商朝以其后的丑月为正月，夏朝以再其后的寅月为正月，这就是汉历中的所谓“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现在的汉历沿用的是“夏正”，即以冬至后的第二个月“寅”月为正月。霍尔月即是以“寅月”为正月，藏历的新年不在霍尔月的三月，而在霍尔月的正月初一。

3. “望”固定为十五日。

霍尔月是固定“望”为十五日，在这里是与藏传时轮历相同，而与汉历不同。因此霍尔月的日期和农历的日期有时重合，有时差一天，有时差一个月，有时差一个月零一天，差一天是因为认定初一、十五的方法不同，差一个月是因为置闰方法不同。

4. 藏历中的霍尔月在计算闰月、决定大小月的重日、缺日上仍保持了时轮历传统的算法。

不难看出霍尔月的前二条特点都是来自汉历中的“夏正”，这种纪月法是在元代通过蒙古传到西藏的，并被藏历所接受，所以历史上称它为“霍尔月”（“胡月”、“蒙古月”）。而后两条保持了时轮历的特点，这种兼有时轮历和汉历两种成分的方法也是藏历特有的方法，从1995年起西藏的历书中已改称其为“bod-zla（藏月）”。在藏文文献中仅出现过“霍尔月”这个名称，没有出现过“霍尔年”、“霍尔日”这样的名称。

上述例子的具体换算如下：第17丁卯周木狗年霍尔月三月初一＝农历甲戌年三月初一＝公历1994年4月11日。

关于霍尔月这个名称的来源，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黑白算问答》一书中说：“成吉思汗于第四个丁卯周的火猪年（1227）取西夏国都，隆重庆功，即以此月为蒙古岁首，星宿月遂以正月见称。”此书上距成吉思汗四百余年，达赖没有说出其根据，也许只是口头的传述。不过，藏族学者都沿用此说。近年山口瑞凤先生对此提出疑问说“据元史本纪，成吉思汗灭西夏是在元太祖二十二年六月，而不是在正月，这种传说是怎样形成的，无法猜测。”无论其确切的年代为何年，最迟到13世纪中叶，在八思巴用藏文写的著作中已经在用时轮历的纪月方式（望宿月）之间夹有这种新的纪月方式。也叫作“王制月”，可能与汉族传统把“奉正朔”作为承认皇帝宗主权的标志有关。霍尔月的引进也是经过抵制和斗争的。布顿大师（1290—1365）比八思巴晚大约六十年，他还在指责八思巴，说他不应该穿蒙古服装，尤其是在传戒仪式中，述僧腊（即僧龄）时不该口称“霍尔月某日”。不过，后来这种纪月法还是被普遍地接受了。历史上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是有一个过程的。

(三) 纪日法

蒙文《俺答汗传》内有两处关于日期的记录涉及到时轮历的纪日法。

A. 第4页蒙古文原文：

bodisong altan qayan γal qutuy-tu em-e taulai jil-un budaday-α kökeler sara-yin yučin-α üker edür-tür butun qatun-αca niyun öken qoyar tegüs törögsen-dür...

汉文译文：“火吉祥母兔年（丁卯）库胡列儿月（十二月）三十日牛日圣者阿勒坦汗生于博坦哈屯。”

B. 第37页蒙古文原文：

čayan moyai jil-dur qatun-u yool-dur kökeler sara-yin arban yiyün-e bars edür-tur qan ejen dalan tabun nasan-tur-iyān taqiy-α čay-tur γaiqamsiy burqan-u sayudal-iyar sayuju tegri-yin γajar-α ögede boluysan čay-tur...

汉文译文：“白蛇年（辛巳）库胡列儿月（十二月）十九日虎日鸡时，在哈敦郭勒河（黄河）畔，君主可汗年七十五岁，结跏趺坐而升天。”

这里面有三点疑问：

1. 这个丁卯年是明朝的正德二年，这一年汉历十二月小，没有三十日，是否藏历？

2. 明正德二年最后一天的干支应该是戊戌，是狗日而不是牛日，怎样解释？

有一位日本学者猜想这个三十日是二十日之误，因为这个月的二十日才是牛日，而蒙文的二十与三十字形相近（森川哲雄：《study of the biography of Altan Kan》九州大学教养部，1987，114页注 [24]）。

3. 这个辛巳年是明万历九年，汉历这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干支是己酉，是鸡日而不是虎日，怎样解释？

藏历中也有用十二属肖纪日的方法，但不同于汉历的六十干支纪日法。这种方法是每月初一固定为虎日或猴日，单月为虎日，双月为猴日，也就是说每两个月循环一次。以正、二两个月为例，列表如下：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鼠	牛
正初 月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这是正、二两个月的排法，三、四两月再循环一次，以下类推，即每年循环六次。无论哪一年都是这样。那么，遇到二十九天的月份，是否顺推呢？不是的，这种算法是以“太阴日”为前提的。太阴日每月固定为整三十天，没有大小月之别。但是把这种算法与太阳日的日期配合时，随着太阳日的重缺、有无，就会出现不连续的情况，起不到汉历的干支纪日的作用了。

有了这个表，上述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十二月是双数月，其十九日正是虎日，其三十日正是牛日，《俺答汗传》的记录用的是藏历的重缺日纪日法，与汉历的干支纪日没有关系，因此，那位日本学者的猜想是不必要的。

(四) 日食、月食的预测与时宪历的引进

(1) 时宪历的引进

检测一种历法准确程度最重要的标志归根到底还是日食、月

食的预测推算。汉族历来认为日月食是凶兆，印度的佛经里与此相反。西藏于11世纪初从印度引进时轮历，其主要目的乃是因为佛经里说：月食时善恶作用增长七俱胝（千万）倍，日食时增长十万俱胝倍。因此，时轮经的信徒十分注重日月食的预测。但是按时轮历推算日食本来就不十分精密，更由于尾数的细小误差经过多年的积累，成为较大的误差，非常需要找寻一种更准确的方法。但是藏族直到18世纪以前，没有从汉族引进更先进、更准确的历法。其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汉族皇家严格禁止历法外传，二是时轮经在宗教上有崇高的地位。

13世纪时的授时历当时在全世界也是最先进的，帝师八思巴（1235—1280）对于历算学是很有研究的，他与授时历的创立者之一王恂（1235—1281）生卒年代几乎完全相同，他们二人在大都很会有机会见面，但八思巴没有引进授时历，究竟为什么？对此我们一直存有疑问。

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16世纪的天文历算。这时欧洲已经有了望远镜等观测手段，其成就超过13世纪授时历的水平。于是以徐光启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向他们学习，1635年制定出新的历法一百三十七卷，取名《崇祯历书》，已经刻板，由于政治动乱，没有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顺治元年（1644）清朝建立，曾经参加《崇祯历书》编写工作的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把这部书稍加删改压缩成一百零三卷献给清廷，取名《西洋新法历书》（后改名《新法算书》），清廷果断采用，顺治二年（1645）颁行，并且给它定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时宪历”。根据“时宪历”所编的历书叫做“时宪书”，每年都有蒙文和满文的译本。时宪历沿用到1911年，改用公历后被称为农历，与公历并行。

藏历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了一些汉历的内容，如霍尔月、二十四节气和春牛经等，但都是枝节的，不成体系的。有系统地从汉历引进的历法只有一种，这就是从北京引进的时宪历。其中蒙

古又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时宪历颁行后，以《新法算书》为主要蓝本，于康熙五十年（1711）便完成了时宪历的蒙译工作，我们称其为《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蒙译本》（三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1715），又“携此蒙文译本送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其译为藏文”。《康熙御制汉历大全藏译本》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选译本，可惜译笔生硬晦涩，加之一些藏族的历算家们缺乏几何三角的数学知识基础，因此无法使用此书。

不久（乾隆初年），有一位雍和宫的蒙古喇嘛（很可惜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为了蒙藏人易于接受，把它进行简化改编，创造出的一套与时轮历的运算方法揉合起来的方法，随即有人用藏文写下来，题为“汉历中以北京地区为主之日月食推算法”，通称为“马杨寺汉历心要”。从此“马杨寺汉历心要”就成为藏传时宪历的祖本。《汉历心要》从甘肃北部的马杨寺传到甘肃南部的拉卜楞寺，1879年在喜金刚院建立这种汉历的传习，每年自己编制“黄历”，直到1958年，八十年间没有中断过。20世纪初年传到了拉萨，在藏医院里设立了传习课程，并将按这种方法推算日月食的结果载入每年编制的藏文年历里，也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了。

（2）藏传时宪历三种本子的比较

我们见过的本子有十几种，其公式和基本数据都是一样的，只是：1. 历元换成近距的，以减小运算的数字；2. 运算步骤的先后有所调整；3. 秒位差粗细不同。

现举出其中三种的特点如下：

1. 我们所得到的手抄马杨寺索巴坚参（bzod-pa-rgyal-mtshan）本，求积月法处有小字注，讲汉历闰月与时轮历不同；求黄平象限处有小注，讲纬度不同的差别；末尾对藏传时宪历的来历和传播的情况有所记载。

2. 国家图书馆藏手抄蒙古人鄂勒斋巴图（öljeibatu）本，其中

求黄赤升度差表有一说明，大段引用《汉历大全》里有关的原文；求各地交食三限的时刻，马杨只给出北京和蕃土的时差，没有给出纬度，此书则给出十八省首府和蒙古二十二个旗的北极高度（即纬度），其中最南的是阿拉善旗 38 度 30 分，最北的是杜尔伯特 47 度 18 分。

3. 乌兰巴托的索玛第 (sumodi) 本《日月食推算法智者生悦》中关于黄平象限有求秒位差细数的方法。

(3) 藏传时宪历的精确程度。

时宪历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属于 16 世纪末欧洲的第谷·布拉赫 (Tycho Brahe 1546—1601) 系统，已经进入近代天文学的领域，其推算日月食的结果是相当精确的，误差不过几分钟。但是经过简化之后的藏传时宪历就没有那么精确了，其误差程度可以参看下面两个实例：

例一

1981 年 7 月 31 日，农历辛酉年 7 月 1 日，藏历铁鸡年 6 月 30 日，日偏食。

	藏传时宪历	天文普及年历	误差
初亏	10h14m48s	9h59m16s	+15m32s
食甚	11h38m58s	11h17m58s	+19m0s
复圆	12h55m53s	12h39m48s	+16m5s
食分	6/12	0.56	+0.04

例二

1987 年 9 月 23 日，农历丁卯年 8 月 1 日，藏历火兔年 8 月 1 日，日食。

A 桑珠嘉措《藏传时宪历文殊喜悦供云》实例。

B 西藏自治区天文历算研究所编《第 17 丁卯周火兔年历书》。

C 紫金山天文台编《1987 年天文普及年历》。

	A	B	C	A 的误差
初亏	7h42m25s	8h20m	8h20m	-37m35s
入食方位	西偏南	近西		
食甚		9h26m	9h51m	
复圆	10h42m54s	10h41m	11h20m	-36m06s
出食方位	东偏南			
食延	3h		3h	0
食分	8/12	2/3	0.57	+0.09
颜色	褐色			

1. 桑珠嘉措是现代公认的藏历权威，他所著的这部书藏文原文为 rgya-rtsis-vjams-dbyangs-dgyes-pavi-mchod-sprin，是 1987 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这个实例是纯粹按藏传时宪历推算的结果。

2. 叙述入食出食的方位和颜色的语言都是时轮历传统的说法。

3. 地点与时刻都是北京。桑珠的实例里还有拉萨和“此地”（指安多地区即甘青一带地方）的时刻，按拉萨比北京迟 1 小时 12 分，“此地”比北京迟 50 分推算的，并不准确。而且食分也没有差别，这是藏传时宪历最主要的缺点。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蒙古历在推算日食月食上用的方法与藏传时宪历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蒙古历、藏历、汉历三者之间互相融合，密切联系，而蒙古历在汉历向藏历传播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蒙古历与藏历、汉历的密切关系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族之间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的范例。除了上述与藏历、汉历相关的方面外，蒙古历的特点或系统，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